

■ 斯人

编者按:近年来,傅振伦、启功、史树青、杨仁恺等文化老人相继辞世,为文化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追思。近日,冯鹏生先生的《中国木版水印概说》列入了《北京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》,在增订版的《概说》中,冯鹏生增加了对启功、史树青、杨仁恺、傅振伦四位老人的回忆文章,此文将分上、下两部分在本刊首发,以飨读者。

日进前而不御 遥闻声而相思

——追忆四位文化老人(上)

冯鹏生



启功先生 1981年留影
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——忆与启功先生的点滴事

启功先生逝世于2005年6月30日,享年96岁。他是名震遐迩的书画家、鉴定家、训诂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,在多学科中都有其真知灼见,业绩彰著,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。尤其是他那种卓荦大气、儒雅待人的风尚,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。

认识先生很早,却从未敢前往问学打扰,只是在“无可”的情况下,也曾冒昧请教。大概是在1978年,先生在中华书局校点《清史稿》。忘记是什么机缘,先生通知我将一篇关于装潢历史演变的稿子送去,帮助定稿。那时我仍属年轻,凭着“气盛”,将稿子送往先生临时工作的地方。当我骑车到中华书局时,先生已在那儿等候。那个时期写的稿子值得请先生斧正吗?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!尽管如此,过了几天,先生竟通知我到他的小乘巷寓所见面。几位兄长陪我到了小乘巷一间狭小的卧室兼工作室。室内到处堆放着书籍和纸张,我们只好坐在先生的卧床边。未等寒暄,先生便伏案翻开了我那篇所谓文章,逐字逐句地念,随之以铅笔改谬,当看到书画形式沿变的段落时,先生说:“立轴条幅画,唐时已经定型,不是有杜甫为王宰山水图的题诗吗?‘壮哉昆仑方壶图,挂君高堂之素壁’。当时的书画形式,并不完全是横卷。”在座的几位都被先生顺手拈来的诗句所折服。因稿子冗长,先生边看边改后,已近午饭时刻,我们几个起身告辞,记得当时都没说声谢谢的话,先生反倒有些歉意地说:“到吃饭的时候,走啦!”接着他又像哄孩子般面带些糖果似地说:“等等。”先生忙挑选

天津市第十八届“文化杯”全国孙犁散文奖评奖征稿启事

“文化杯”文学评奖活动连续举办了十七届,已成为天津市群众文化活动的优秀品牌。特别是近几年,“文化杯”评奖范围辐射全国,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参加,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,促进了天津业余文学创作队伍与外埠的交流,提高了群众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。

2009年将举办的第十八届“文化杯”全国孙犁散文奖征文评奖活动,特别增设东丽文学奖、新人新作奖,并将评选优秀散文集。此次活动将面向全国所有热爱文学创作的业余作者征稿。本届评奖由天津市文化局、东丽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,天津市群众艺术馆、东丽区文化局承办。

一、对选报作品的要求

1. 单篇散文和散文集均可参赛。

2. 作品必须是2006年以来在报刊(含内刊)发表过的原创新作,散文集须由出版社公开出版。

3. 此次评奖只面向全国业余作者,各省市专业作家、文学院签约作家(包含项目签约作家)无参赛资格。

4. 必须报送作品发表原件或原件复印件,以证实发表刊物和日期。散文集至少报送样书1本。单篇散文每人报送不得超过2篇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

朱竹映霞(1994年) 启功

规合矩;知道先生是鉴定家,必然要精研历代书画,查阅古籍,然后铸成黄钟大吕之音;知道先生是名震遐迩的学者,必然要考虑得当落笔,抑引随时,变通适会而构著鸿篇;知道先生是训诂家、文学家、教授,必然要斟酌讲义,准时课习子徒;况后些年启功先生又肩负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、中央文史馆馆长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等要职,必定诸事繁多,时间极为宝贵,故从未有名为“看望”,实为“打扰”的举动。但凡经过我向先生索取“赐墨”或题写书名堂号的,我都是便中请人代办,且一一应愿。记得1986年的一天,先生还着人转来一幅写给我的法书,诗意含蓄,并有题记数行。经反复咀嚼,方领悟到其诗是旨在鞭策我于事业上应图精进,其边题褒责有之:“我曾有出语不当处,应自省”,反映出了先生对人的真挚之意;所指我的“擅长”则言之有过。故而此幅也未

曾敢于示人,也只是折叠着置于书架20多年矣。

如今回想起来,我烦劳先生所做的事情太多了,不知耽误了他多少宝贵时间。即是在“稿酬”通行的情况下,凡我托办的事情,并没给过一次报酬,我也尚无一杯热茶敬给先生,反倒让先生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。先生病中,多次拟随他人去医院看望,总是唯恐“添乱”而作罢。虽多次请人带去祝愿,但在启功先生仙逝三年后的今天,尤感深深的愧疚和忏悔。前辈宋振庭曾为我书联云:“一贵一贱交情乃见,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”先生卓然不同,对于弱小的求助者,总是投以一腔的热情。先生旅途漫长,艰难坎坷,有沉有浮,但能心胸坦荡,意气风发,宏著等身,吐纳自深,酌处万机,适度得宜,令人仰慕,堪称学界之楷范。揣其成因,我认为恰如宋王安石云: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

“竹才生便直,梅到死犹香”——怀念史树青先生

史树青先生是一位博学、执着、坦诚、率直,令人尊敬的老人。因为他知识面广,所以对于一些人难以涉及的问题的研究,他都视为己任,殚精竭虑,取精用宏,直至讲深说透为止,显示出了强烈的敬业精神,堪称文博界的支柱。

先生寿年86岁,于2007年1月7日逝世。我认识先生已是70年代末,那时为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大批辽代文物,成立了应县木塔文物整理小组,先生任组长,我都忝列小组成员,故能有幸经常随他和傅振伦、张畅耕、郑恩淮诸先生整理刻经、写经、绘画等。这批文物是研究辽代历史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的第一手资料,极为珍贵。因为是在塑像内发现的,秘藏800年间,屡经鼠患,部分经卷、画幅已残断酥裂,有的撕成碎片,有的糜乱成团,故而需要清洗展平碎片,依经文校核复位,逐字逐句地相字形,鉴纸质,量醋口,进而修补成卷,逐而考定经名画名,释读内容,编写叙述。在这大量的工作中,史先生总是先说出自己的修复方案、研究思路,引导大家各抒己见。后来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辑成《应县木塔秘藏》巨册,由文物出版社见粹,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在数年的研究过程中,史先生所显露出的大学者风度令人钦佩。正如前史树青先生在《怀念史树青先生》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:“史老不仅仅是一位著名

的鉴定家、学问家,而且是一位胸怀坦诚、绝无城府,真正的纯真的老人。”史先生往往在阐述一种观点时,只论事,不论人,直言坦陈、观点明朗、毫不造作,具有那种令人敬重的“千首诗倾万户侯”的凛然气概。但他生活在上是非常节俭的。整理小组有时在饭店活动,每当开饭前,先生总是先嘱咐经办人说:“不要乱点菜,吃点饭就行啦,国家的钱要节俭。”

先生在研究学问方面,具有严肃谨慎、一丝不苟的作风。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,他就木塔发现的12卷《契丹藏》的重要性说:“就全藏的雕版而论,当属《开宝藏》为最早,惜现存仅是残卷,还有人说这些残卷,亦属崇宁、大观(1102—1110)年间重印。现在推知《契丹藏》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开始雕造,尚属国内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,极其珍贵。多年来,学者们未睹实物,都在翘首企盼,所以我们要求准确无误地将这些经卷的原貌、特点表述出来,公诸于世,这对于研究辽代的经济、文化、科技等都有重大意义。”又如他发表在1986年第6期《文物》上的一篇《应县木塔佛容寺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》,文中先生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,大都是写在卷子的正反两面,残损严重,这些文字缺头少尾且笔迹潦草,又无逗号,乱如天书,很难释读。史先生对这些残经断本逐一考证,释读原文,明确内容,然后分别判定哪本属讲经文,哪本属讲经念诵,哪本属何经的变俗文讲,哪本属类似后来的白话小说,哪本属五言、七言唱词等等,都厘定得清清楚楚。先生为证明这批文物的重要性,还以此与敦煌发现的各种俗文学本子进行对比,得出结论说:

“这次木塔发现的辽代讲经文、变文、俗曲等,不论内容、仪式,都可看出唐、辽时期寺院的俗讲基本无大差异。”诸如上述,那些学问都很窥伺,而先生都能弄清来龙去脉,显示出了他深厚的学养,有几人能与之比肩?

凡是比較了解史先生的人,无不赞赏他对文物事业那种无限热爱、忠诚的精神。记得1990年前后,他嘱我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:山东即墨县发现一幅明代的重彩人物画,画面人物的脸部,在“文革”中被红卫兵以墨汁涂盖。有一天,先生通知我到历史博物馆一趟,商讨去污办法。此为绢本,墨已浸入绢缕,如何去净?我有难色。但先生却执言说:“类似这种情况的一批,被糟蹋得面目全非,如不设法修缮,已如废物。这批文物比较重要,你去试试,只能修好,不能搞坏!”先生的责任心感染了我,只能遵着先生的宣言,将画携回摸索去净。过了些天,当先生看到画上的污墨已除,画面焕然,神形毕现,非常高兴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寄来一册《人民中国》杂志。原来先生请人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其事,并刊发那幅修复后的照片,以示对晚生的勉励。在随先生整理辽代文物期间,为了弄明白一些佛画和经扉画的表现内容,就必须找些不易找到的参考书籍。当时已过花甲的史先生从不摆出大学者的架子,需要查书,他就带领我们几位后学多次到图书馆查找,并随时为我们讲述使用工具书的便捷方法。和他在一起,总觉得像沐浴着和煦的阳光。

先生可歌可颂的事例,枚不胜举,种种事实说明,论学识,他广博深厚;论处世,堪称风范;论品尚,他率直赤诚,浩然无瑕。宋人黄庭坚诗云:“竹才生便直,梅到死犹香。”史先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。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、特聘教授,装潢史及版画印刷专家,书画鉴定修复专家。见报文字有结构调整和删节。)



山东即墨县发现的一幅明代重彩人物画,在“文革”中曾被以墨汁涂盖,两图为修复前后的对比。

大 盛 魁

号事的处置权,对后继经理的任用也有着决定的权力。别家商号的财东是字号赚钱的时候财东按股份分红,字号赔钱的时候财东也要按股股清偿亏损的数额。大盛魁财东则是不管字号赔赚,他们照例分红,并不承担任何风险。

分而不乱 统而不死

大盛魁的分支机构和小号数量非常多,但在账目上它们都单独核算。投资方式也是不拘一格、灵活多样,既是统一于归化总号,又是相对独立的,赚了钱有总号的份,赔了钱则自负其责。

大盛魁的许多分支机构并不冠以大盛魁的名义开设,而是由大盛魁出资股东,另聘掌柜经理。

大盛魁成立之初,由大盛魁出本银十万两,护本银十两,共作十个财股记在万金账上,但是不以大盛魁记名,而记的是荣昌的名。而荣昌为开展业务,又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沈阳、齐齐哈尔、锦州、张家口、包头等地设置了许多庄口,形成了总号辖小号,小号再设分庄这样的特殊组织机制。所有这些庄口在业务上都归总号领导,但在具体人事和业务上的事总号均不直接插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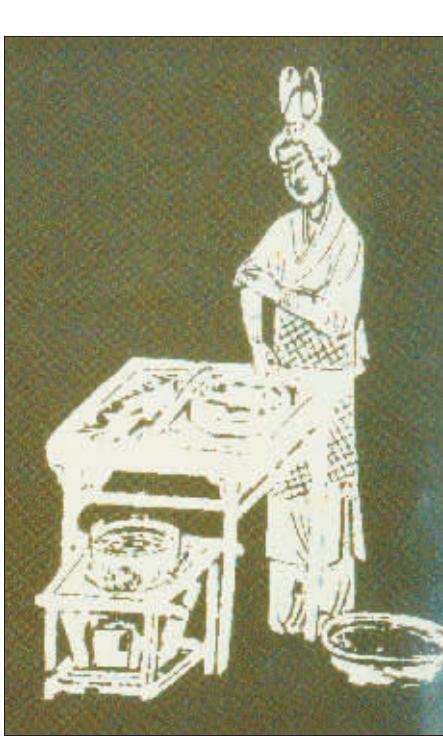
对人才的重视和严格的人用制度也是大盛魁制胜的法宝。大盛魁的大小经理和顶了生意的伙计,都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;其他字号的人就是再有本事,大盛魁也是一概不用的。学徒入号,必须学满整整10年才允许回家探亲。在大盛魁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聘请过外号的人。录用学徒也十分严格,除了相貌端正、身体健康、有一定的文化外,还要求必须是没在别家商号做过事才行。

此外,“职员放假回家不得于财东家坐食”,以防某些号员为一己私利与财东勾结干涉号事,进而破坏经营权独立。字号规定号内人员如遇婚嫁娶和其喜庆,由字号统一庆贺送礼,职员不得相互送礼,以防号员拉帮结派,结党营私,触犯主要号规者,不论资历深浅、地位高低一律开除。号规规定财东只能在结账期间行使他的权力,平时字号不接待财东食宿,也不借给财东钱物。财东不得随意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做事,不得对外代表字号。字号不接受财东的子弟进号学徒。

大盛魁的经营就是靠这些颇具现代色彩的管理机制来实现的。但随着清末沙俄在边疆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,大盛魁的营业收入受影响,日见萧条,逐渐淡出视线,结束了它的历史神话。然而其对市场的探索、开发等丰富经验,严密有效的管理办法等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。

这批画像砖刚刚公布时,曾迷惑了一些资历很深的研究者,认为画中绝非婢女之流。但她们确确实实就是厨娘,就是廖莹中描述的体态婀娜、精明洒脱、身怀绝技的宋代厨娘。

(摘自《中华文化画报》2009年第1期)



宋代厨娘画像砖拓图

宋时厨娘好风光

王仁湘

视,蔡京所用厨婢达数百人之多,这个数字相当惊人。

宋代廖莹中的《江行杂录》,记录了宋时京都厨娘的一些情况,与唐时岭南有些相似。田氏说,京都中下之户,并不看重生男孩子,生了女孩反倒爱如捧璧擎珠。待她们要长大成人的时候,就遣其资质教以不同的本领,其中的一些被培养成了厨娘。厨娘被认为是“最为下色”,但非极富贵之家是别想请到她们去做饭的。

厨娘的地位虽不高,但她们却有绝妙的技艺和超然的风度,令人侧目。《江行杂录》说,有一位告老还乡的太守,想起在京都某官处吃过晚膳,那一日是厨娘调羹,味道特别适口,留下很深的印象,于是也想雇一位厨娘,摆一摆阔气。他费了很大劲才托人在京师物色了一位厨娘,年可二十,能书会算,颇具姿色。不数日厨娘即启程前往老太守府中,未及进府,在五里地以外住下,遣一脚夫先给太守递上一封书。信是她亲笔所写,字迹端正,很体面地要求太守发一抬暖轿来接她进府,太守毫不迟疑地照办

了。待到将厨娘抬到府中,人们发觉她确实不同于一般庸碌女子,红裙翠裳,举止文雅。

太守大喜过望,第二天便请厨娘露展本领。厨娘随带着璀璨耀目的白金餐具,至如刀砧杂品,一一精致。厨娘换上围裙围裙,挥刀切肉,惯熟条理,有运斤成风之势。做出的菜品馨香脆美,清新细致,食者筷子举处,盘中一扫而光,纷纷说好吃好吃。

厨娘的手艺得到来宾的交口称赞,太守脸上平添不少光彩。宴席圆满结束,厨娘还要做一件大事,她对太守说:“今天是试厨,您也非常满意,但照规矩得给我犒赏。”说着还拿出一个单子给太守看,单子上说每次办宴会,要支赐给厨娘绢帛或至百匹,钱或至二三百。太守不得已勉强照数支付,但私下里却叹着气说:“像我们这样的财力单薄,这样的筵席不宜经常举行,这样的厨娘也不宜经常聘用。”没过两月,太守就找了个理由将厨娘“善遣以还”。办一次宴会,要讨一次赏,